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与孙中山齐名。他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功勋昭著，受到举国人民的崇戴。而他功成不居，诚恳厚重，顾全大局的磊落胸襟及矢志革命的品质，更为世人所共仰。

黄先生对名利看得十分淡薄。他曾说：“名不必自找，功不必自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1904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他首先提议推选孙中山先生出任总理，自任庶务部长。当时孙中山正奔走于欧美、南洋各地为革命筹款，同盟会总理的职责实际由他代理。他既要回国奋战于前线，又要顾及东京总部的会务，“忙迫劬苦”可想而知。但他毫无怨言，“只求义务，不求权利”。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京沪亦告光复。各省都督府留驻上海的代表，共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帅，负责筹建临时政府。黄谦让再三，不肯承认，并说：“兴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河山而后已”。孙中山返回国内，被各省代表选为大总统，副总统选举时，黄兴呼声最高，可他极力支持黎元洪当选，自己宁可受任陆军总长。他常说：“吾辈革命，非为作官”，而应“致力于国家建设”。足见其“功成不居”，是以国家为前提的。

黄兴对己“功成不居”，待人则诚恳厚重，顾全大局。二次革命后，黄兴与孙中山先生在讨袁军事与整改党务问题上存在分歧。外界对“孙黄”关系滋多猜疑，反动派更乘机挑拨离间。黄则以“矢志民国”为重，尽力“化除成见”，并极力维护孙中山的威望。其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亦对孙有所误会，他们“意见很大”，甚至酝酿在东京开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黄闻讯立即驰书斥责，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平息了东京的倒孙风潮。而后，陶、章等人，仍大搞分裂活动，写文章攻击孙中山。黄兴不但拒绝发表这些文章，还致信告诫他们，信中写道：“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

领袖互相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望我各位同志,相与协力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同时,他还致书孙中山先生,“说明委曲,请求大度包涵。”黄兴以其气度与识力,顾全大局,协调其间,不仅加强了同志间的团结;还使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威信,仍如“众星拱北辰”。

(例二) 陈景华的爱民政绩

陈景华(?—1913)字陆逵,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举人出身。曾任广西桂平知县。后因抵忤两广总督岑春煊,被革职查办。陈景华遂流亡泰国,加入革命运动。

1911年广东光复,陈任警察厅长。当时革命刚刚成功,腐朽黑暗的清政权刚刚推翻,市面混乱,正面临百废待举的局面,陈景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革陋习、除强暴,做了不少安定民生的事,是一位亲民爱民的革命党人。

新政权建立之初,广州匪盗横行,残害百姓,社会生活很不安全。陈景华采取断然手段对地痞、扒手、惯匪、黑社会的强横分子一一加以严厉处置,很快地安定了市面秩序。当时广州有一个黑社会组织,名叫“百二友”,党徒杀人越货,无恶不做。给社会带来很大威胁。陈为了给百姓除害,想尽办法铲除他们。一次,他终于得到消息:这帮黑社会团伙中一些人要在黄花岗会面。他派出精干探员伪装成摄影师,给他们拍照“留念”。这群头脑简单的党徒们果然列队合照。结果陈景华利用照片“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了“百二友”黑社会团伙,为民除了一大害。

广州市在清廷统治时为了防范人民,市街多设有木闸。每到黄昏,便关闭街闸,只留出供一人能侧身出入的空隙。晚上九时,便紧闭加锁。这不但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妨碍交通。一旦发生火警、匪患,都遭受阻隔。有些富商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也

私设路闸，雇夫守卫。陈景华通令全城，限于三日内全部拆除，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很大方便，深得百姓的推重。

陈景华还有一件爱民的德政，致今被百姓称颂。他发现广州的婢女、童养媳、尼姑、幼妓等下层社会妇女备受凌辱、生活无着的惨境，立志要开一所女子教育院，来解决受压迫妇女的衣食、工作及受教育问题。他先召集了各慈善机构的头面人物开会，希望得到他们的赞助。怎奈这些所谓善人们不仅不出资，反而对陈的动议讥讽相加，推三阻四。陈景华气愤之余，决定扫除一切障碍自行办理。他择定革命后被封的仙祠作院址，聘请了教职员，很快地准备就绪，迅速开办。同时通令部属，凡发现或自动投奔来的被压迫被虐待妇女，一律送院收容，分班教育习艺。这事在广州引起轰动，受压迫、虐待的妇女好象逃出地狱，迈向光明，既得衣食温饱，又为日后自立于社会学会了劳动技艺。女子教育院几个月内，就收容了数百人，受到百姓的热诚拥护。但也有一部分人误会、观望，甚至遭到那些摧残、压迫妇女、娶妻蓄婢的富人们的切齿痛恨。然而事实最有说服力，妇女们掌握劳动技能和文化知识，自食其力地重返社会后取了社会地位。逐渐地，一部分先前有误会而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也消除了成见。新闻界参观后也交相称誉，推许陈氏是“万家生佛，被压迫妇女的慈航宝筏。”

非常可贵的是，陈景华开办妇女教育院，并非出于单纯的“慈善”目的，而是基于解放妇女的思想。他在起草此院兴办缘起时开头就表明，“中国女子苦人也，初而育之，教则缺如”。因此妇女才“人权剥落，侔于非人。”他将妇女失去地位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受不到教育，是不全面的，但他解放妇女的思想却是可贵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景华被袁世凯复辟势力杀害。但因他生前亲民爱民，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百姓为他立碑造象，供人凭吊。

(例三)

“心雄万夫”三把火

阎敬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后一直为官，清正廉洁，参惩贪吏，对恶势力斗争“心雄万夫”，1882年迁任户部尚书。他深知户部弊端，尤其是天下财富总汇的北档房，积弊更深，便下定决心烧了三把火，革除积弊，实行改革。

阎敬铭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亲自查账，并找来档房司官问账，结果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有多少，以及出纳和盈亏的情况，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他对此十分气愤，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户部档房账目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不被贪官污吏所利用，于是他立即上奏，建议改革档房管理，“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清政府立即同意了他的奏请。

阎敬铭上任后的第二把火，就是亲自清查库房，即户部管辖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经过清查，发现三库物资堆放杂乱无章；账目混乱，进出账目竟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物资损坏，缎匹和颜料大量霉烂，虫蛀鼠咬，无法使用；官员贪污偷盗成风，弊端累累。鉴于此，他当即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参奏了号称四大金刚的司官姚覲元、董俊汉、杨洪典和旗人启某，使其革职回籍。

阎敬铭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就是揪出了云南军费报销案。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然后把大量的公款揣入私囊，户部明知故纵，借机从中收取贿赂，通同作弊。云南的军费报销，先是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额公款，来京通过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打通关节，户部书办一张口就要13万两银子“打点费”，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以8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阎敬铭经过调查，促使一些知情官吏打消了顾虑，首先御史陈启泰上奏朝

廷,揭露了周瑞清和户部官吏在云南报销军费中的受贿事实,随后又有不少人纷纷指控王文韶、景廉,要求政府严加制裁。清政府深感问题严重,加紧了对案情的处理,并指派阎敬铭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情结束,与案情有关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其中受贿的户部云南司主机孙宝穆革职退赃,徒三年;太常寺卿周瑞清革职退赃,流放3000里;潘英章、龙继栋、李郁华也被革职流放;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受到了降级处分。

阎敬铭勇于向贪污腐败的邪恶势力做斗争,在任户部尚书不长的时间里,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革除旧弊,实行改革,这种精神在积弊已深的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例四)

曹彬有功不矜伐

曹彬(931—999),字国华,北宋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他是北宋开国的功臣,曾用兵后蜀、南唐、北汉,屡官都监、枢密使。他为政谦恭,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因而备受时人的好评。

早在后周显德五年(958),曹彬奉周世宗(即柴荣,954—959年在位)的诏命出使吴越。吴越多次给他送礼,都被婉言谢绝。及至上船以后,吴越又派人带着礼物,坐上轻快的小舟追赶上来,他不得已将礼物收下了。曹彬回国后,立即将这些财礼上交国库。周世宗听说后,很受感动,传令将吴越馈送礼物全数赐给他。他盛情难动,收下后,又全部分送给诸亲友。

当时,赵匡胤(即宋太祖)典掌禁卫军,威权莫贰,不少王公大臣都争相请托。希望得到赵匡胤青睐,曹彬却与众不同,他除公事以外,概不登门私访。赵匡胤代周建宋称帝(960)以后,曾私下问他:“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可你为什么老是有意疏远我呢?”曹彬说:“我是周室近亲,又任朝廷内官,本职工作还怕做不好,又那里敢去巴结皇上呢!”于是,宋太祖更加器重他。

建隆二年(961)冬,曹彬以都监身分随刘光毅讨伐后蜀。后蜀乱事平定以后,宋军诸将多取子女玉帛,满载而归,而曹彬“囊中唯图书、衣衾而已”。宋太祖以功升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再三推让不受。宋太祖说:“卿有茂功,又不矜伐……,可无让。”意谓你立了大功,却不夸耀自己,也不骄傲自大,你不要太客气了。于是,曹彬清介廉谨和居功不傲的声名更传开了。

曹彬在出师南唐时,也是从不邀功。当时,南唐后主李煜屡战屡败,希望宋军暂时停止进兵。曹彬分析当时形势,决定以攻心为上。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宋军兵围金陵(今南京)。他为了保全城内百姓,在即将攻克金陵时,怕将士们趁机残害百姓,便诈称自己病了。众将们听此消息,争相赶来探望他。他说:“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的,唯一希望诸公在城破之日,不要杀一人,我的病就好了。”众将们于是焚香发誓,表示要谨守诺言。后日,金陵城陷。宋军入城时,军纪肃然,受到金陵百姓的热烈欢迎。对于请降的南唐李后主及其大臣,曹彬好言安慰,待之以宾礼。曹彬凯旋班师回朝后,也不上书表功,只是在名片上写道:“奉敕江南干事回。”意思是说:“皇上交给我去江南办的事完成了。原来,在出师以前,副帅潘美(即潘仁美)听宋太祖说过,如果曹彬能平定南唐,当委任曹彬为宰相。潘仁美于是预先向他祝贺。他却淡淡地笑着说:即使平服了南唐,也不能算是自己的功劳,更谈不上丞相这个极品的官职。及至南唐归宋,宋太祖赐予曹彬二十万钱,不久拜为枢密使。

曹彬身为国家大臣,生活俭朴,家无余财,薪俸多散给宗族。史书上说,曹彬“伐二国(后蜀、南唐),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对于自己的僚属,他总是推己及人宽宏大度。曹彬在知徐州时,有一吏员犯罪,按法当处以杖罚,他却迟迟没有这样做,人们都觉得奇怪。他说:“我听说此人新婚,如果马上杖罚,他父母必然以为儿媳妇带来不吉不利,从而日夜招致鞭打责骂。要

是这样,这个儿媳妇恐怕就难于自存了。我拖延杖罚那个吏员,于法也并不妨碍。”

咸平二年(999)曹彬病死,年 69。宋真宗痛哭失声,追赠他为中书令,封济阳郡王,与宰相赵普同配飨宋太祖庙。

第二章 处长应具备的政治素质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五项条件。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都要具备的政治业务素质的五条基本要求,这是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处长也不例外。要率先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政治业务素质的五条基本要求,使自己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

第一节 处长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

政治理论水平是处长政治素质的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这是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根本标志。各级党委必须把加强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努力培养造就一批真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领导干部。

一、要认真学习 and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1.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和解决问题,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具有统揽全局的能力。